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刘建军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刘建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刘建军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309-07414-7

I. 当… II. 刘… III. 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D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8322 号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刘建军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邬红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37 千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414-7/D · 460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是驱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思想资源，其变迁如镜子般映照着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本书从政治学的视角入手，在吸收哲学、文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资源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产生的外在条件、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关注的主题。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既是驱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思想资源，又是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文化反应。本书要回答的问题是：（1）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与近现代政治思潮有何异同？（2）为什么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经历了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并立的格局转换？（3）作为政治思潮生产者与传播者的知识群体与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和西方知识分子相比具有怎样的当代特质？

本书的结论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实际上体现为三重面向：作为颠覆力量的政治思潮、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以及作为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正是其不同的面向导致了其不同的价值指向和介入线路。由此，本书阐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现实与政治思潮的互动关系，为学术界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起点。

目 录

第一章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概述	1
一、政治思潮的内涵	1
二、政治思潮兴起的外在条件	6
三、政治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	12
四、政治思潮的主题	24
第二章 以价值重估为中心的政治思潮	34
一、人道主义：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估	34
二、新传统主义：价值重建的政治努力	46
第三章 以改造权威体系为中心的政治思潮	63
一、西化思潮：对权威体系的激进化改造	63
二、新权威主义：对权威体系的务实化改造	79
三、精英主义：对权威体系的知识化改造	102
四、政治生态主义：对激进与保守的调和	110
第四章 以重构国家—社会关系为中心的政治思潮	115
一、市民社会思潮：重构国家—社会关系的现代努力之一	115
二、自由主义：重构国家—社会关系的现代努力之二	123
三、“新左派”：重构国家—社会关系的革命化努力	140
四、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	147

第五章 超越“左”与“右”：以改革政府为中心的政治思潮	
.....	159
一、“第三条道路”：超越“左”与“右”	159
二、治理与善治：改革政府的呼声	169
第六章 以回应全球化为中心的政治思潮	194
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194
二、民族主义：后冷战时代的回应	203
结 语	225
一、中国知识群体的“当代特质”	225
二、政治思潮的介入机制	231
三、政治思潮的三种面向	235
参考文献	238
后 记	245

一、政治思潮的内涵

(一) 政治思潮的定义及其取向

在了解政治思潮的内涵之前,让我们先看一段两位美国学者在《二十世纪社会思潮》一书的开篇所说的话:“近几年来,人们已经能够解决工程学、医学和技术学领域里的各种各样的困难问题,这种趋势已十分明显。但是,当我们着手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时,并不比二三千年前好多少……我们在某一方面战胜了物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也战胜了错综复杂的生物现实世界。但是,我们似乎不能得到一种能使我们生命发挥最大效益的智慧。”^①也就是说,物质上的成就和技术上的进步,并不能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提供足够多的智慧。单单凭借丰富先进的技术资源和物质资源,不能为人的生活描绘出美丽的蓝图。于是,政治思索、文化反省、艺术想象、心理波动等人文现象就不间断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政治思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显示了人们探求政治智慧、思索政治生活的勇气。尽管这种探求和思索不乏简单粗陋,甚至还过于意气偏执,但我们的生活世界如果缺乏了政治思潮的兴替与更迭,也就丧失了反思和警觉的冲动,更丧失了前进和完善的勇气。政治思潮的价值可能就在于此。

那么,政治思潮的内涵是什么呢?

^① [美] 雷蒙德·保罗·库佐尔特·艾迪斯·W·金:《二十世纪社会思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

《辞海》中对思潮的界定是：某一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倾向。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思潮见长的中国政治学家徐大同先生认为，政治思潮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可大致归结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共同政治倾向和较为广泛影响的重大政治思想潮流。这一概括的基本含义在于：思潮具有理论导向作用，即对某一时代的普遍政治观念甚或政治学说的发展方向具有直接的带动作用。从政治概念研究的视角来说，它与政治学说的不同之一在于：政治学说历史影响长远，相对稳定持久，可能一时不为更广泛的民众所知。而政治思潮是一种社会层面的、宏观的、动态的思想倾向，它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的意义。判断某一政治思潮的特点、地位和重要性，不是取决于它在某一历史时期是否重复出现，存在多长时间，而是在于它能否成为标志政治观念发展的潮流。凡能够成为某个历史时期具有主导性的政治思潮，其总是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影响某种政治运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学说的发展^①。高瑞泉先生认为，严格意义的社会思潮，是指较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运动，是特定社会的各种矛盾尖锐化、复杂化在思想领域的反应，通常是从知识分子群体发端，推向或大或小的社会层面，进而影响生活世界和大众心理的思想运动^②。笔者认为，高瑞泉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社会思潮更接近于政治思潮。因为政治思潮的兴替不是纯粹的精神运动和观念运动，而总是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和实践取向。所以，一种政治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思潮，主要是因为它合乎了以下几个标准：一是它能够抓住当时社会最为敏感的问题，并能够对这些问题在价值、实践层面上做出明确的答复，尽管其理论根基不是非常深厚和准确，但是它面对的问题却是整个社会非常关心并且是亟待解决的。具有鲜明的时效性和敏感性。二是它在当时社会中的扩展程度和影响程度已经不局限于狭小的主体范围和空间范围之内，而是已形成了一股较为盛大的文化力量，具备动员社会民众、促进社会改造的特点。三是要有一定的时间限度，尽管时间标准长短不一，但一定不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政治思潮的内涵。

1. 政治思潮的价值取向

任何一种政治思潮都表达了一种鲜明的政治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取向带

^① 参见徐大同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有很强的排他性特点。也就是说,在价值层面上,一种政治思潮与另外一种政治思潮几乎是没有有什么共融性的。当然不排除它们在某些观点上有交叉与重叠。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中,价值之争是相当激烈的。政治思潮几乎都把政治的某一指向无限放大,甚至推向极端。正是这种排他性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政治思潮具有较为壮烈的导引效应和鼓动效应,也正是这多姿多彩的思潮构成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观念世界”或“意识形态丛林”。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纷争与这个人造的“观念世界”和“意识形态丛林”密切相关。

2. 政治思潮的实践取向

正如美国学者雷蒙德·保罗·库佐尔特和艾迪斯·W·金在《二十世纪社会思潮》中所说的:“社会思潮的实践价值向外扩散到个人,使之通晓这种思想并能运用它。”^①政治思潮代表了对政治生活思索的思想成果,它在价值和制度层面上,表达了一种继承或否定某种政治传统的设想和方案。政治思潮都包含着对政治问题的诊断和治疗。实践取向导致了政治思潮向国家权力中心渗透的倾向,甚至会一度影响一个时代的政治发展进程。故我们可以从政治思潮的兴起中看到一个时代的政治特征。

3. 政治思潮的问题取向

一般说来,政治思潮均具有明确的问题指向,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关注的问题存在差异而已。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几乎每一种政治思潮都把价值问题置于首位。这是与新旧时代的交替相适应的,因为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价值问题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社会的常规化、结构化运动将一些规则和程序固定下来的时候,政治思潮便通过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关注,表达着对某种价值的肯定与颂扬。于是,我们看到在现在经济体系非常成熟、社会结构非常稳固的国家中,一种观念能否成为一种政治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问题取向的强弱。政治思潮通过对某种社会问题之政治根源的揭示,表达着某种政治信念和政治主张。

4. 政治思潮的流动取向

相对于政治学说或政治思想来说,政治思潮是流动的、动态的。它既包含着从发端者向受众者的流动,也包含着从一种政治思潮向另外一种政治思

^① [美] 雷蒙德·保罗·库佐尔特、艾迪斯·W·金:《二十世纪社会思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页。

潮的流动。前者是由其实践取向所决定的,后者是由其价值取向的排他性所决定的。流动取向导致了政治思潮的兴替和多彩,也说明了人们的政治思考随时代的变革而变化。

(二) 相关概念辨析

1. 政治思潮与政治文化

政治思潮的价值取向、实践取向、问题取向以及流动取向,说明政治思潮乃是一种具有改造、扩张、流动效应的文化力量。它不仅影响政治思想的发展,而且还对现实的政治变革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政治文化则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政治的态度,再进一步说,政治文化是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发生的主观环境。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的“集体记忆”^①,例如美国式的竞争性个人主义、法国人的国家至上以及中国的官本位心理,都是该国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这些集体记忆构成了稳定的、具有延续性和持久力的政治文化。可见,政治文化构成人们看待政府的态度、个人对于政府的角色。所以,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是一种稳定成型的文化—心理结构。而政治思潮并不具有政治文化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政治思潮的流动取向恰好说明变幻与兴替是其主要特征。一种政治思潮可能来源于该文化—心理结构,也可能与该文化—心理结构背道而驰。

2. 政治思潮与政治理论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理论乃是对一种社会事实的特定维度所作的系统性解释,或者说是用来解释社会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②。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美国政治科学以外的那种“政治理论”主要是一个范畴术语,涉及的是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经典著述的基本原则,以及与哲学、政治学和历史等领域的当代论著有着松散联系的那些内容。在美国,政治理论主要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都可以用政治理论加以概括。而政治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特定时期知识群体对特定问题的批

^① [美] 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② 参见[美]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

判与思考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当然不能排除政治理论、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潮的关联性,甚至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为政治思潮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概念资源,也不能排除某一政治思潮会引发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革命与重建。但是,政治思潮的时效性与当下性,决定了其缺乏政治理论与政治思想所具有的贯通历史、超越时空的秉性。

3. 政治思潮与学术话题

政治思潮显示的是一种思想的力量,它代表了一种价值判断。尽管政治思潮要拥有一定的学科基础和学术基础,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是借助媒体、出版甚至网络等传播体系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景象。正是政治思潮的文化效应、宣传效应和鼓动效应,使其与学术性的学术话题区别开来。在当代中国政治学领域,有许多学术话题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党政关系、政治稳定、反腐败、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协商民主等,但这些政治学学术话题并不注定形成一种具有文化效应、宣传效应和鼓动效应的政治思潮。尽管两者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但从特性、内容和阐述方式来看,两者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4. 政治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任何政治思潮都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范围,例如我们把古典自由主义、古典保守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现代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共产主义都列为经典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范畴。许多意识形态都根源于某一种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潮。例如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就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在社会科学中,广义的意识形态被看作是信仰体系,它们提供对特定社会政治秩序的一致而又相当稳定的说明,或者对如何实现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提供一种程式化的看法。它们常常以关于人类本性的核心构想和历史哲学,来说明我们如何抵达目标以及我们该走向哪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简化了的政治哲学、学说或世界观^①。按照经典的政治学解释,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美好社会的文字表述,一种建构此种社会的最终手段。政治意识形态不是以平和的、理性的态度来理解政治系统,而是要承诺改变政治系统^②。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所

① [英] 肯尼斯·麦克利什:《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点》(中),北京:新华出版社,第707页。

② [美] 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研究的各种政治思潮均具有意识形态的一般特性。但是,如果某一种意识形态被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权力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那么该种意识形态便具有一种统摄地位,例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由主义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可能是冲突的,也可能是互补的、共存的,这取决于该种政治思潮的指向、目标甚至它自身的“政治正确性”。例如西化论就因为其与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对抗性而遭致否定和排斥,而治理与善治思潮就因为它展示了一种建设性的指向可以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共融,新传统主义则因为包含着与国家意识形态共存的一面,从而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延续下来。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在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发展的历程中,存在着两条并行的线索:一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化完善和渐进突破^①;二是知识群体沉思能力的兴起与知识群体立场的变迁。前者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反映,后者则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在社会文化与民间思想上的反映。

二、政治思潮兴起的外在条件

政治思潮的更迭是一个时代的旋律,它的变迁代表了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节奏。因此,仅仅在“观念史”的框架中,关注简单的文本,对于研究政治思潮是有很大缺陷的。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者斯金纳开创的历史的研究方法,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把注意力从只关注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或者说“历史的”方法,要在历史的语境中考察那些观念和信仰。政治思潮不仅是“观念史”的构成要素,也是“政治史”的构成要素^②。一般而言,“政治史”是由政治事件、政治制度的变革以及政治人物的活动所构成的。事件、制度和人物构成了政治史的“物理要素”,但是,体现政治变迁之思想节奏的政治思潮,则构成了政治史的“观念要素”。从政治思潮的变迁和替代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们的政治态度

^① 参见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② 参见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昆廷·斯金纳主编:《近代英国政治话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和政治期望,而且还可以看到政治变革所依赖的思想资源是如何生长出来的。

把政治思潮从纯粹的观念史中解放出来,激活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政治记忆。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仅剥落了蒙在政治思潮身上的神秘外衣,而且也把人们从漫无边际的想象空间中解放出来,从而拥有了一份政治的冷静与成熟。如果把政治思潮单纯局限于思想领域而体会其抽象的理论美感,那就等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想象史观”、“观念史观”,“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①所以,政治思潮史的书写与政治哲学史的书写有着很大的差别,政治思潮所受的物质纠缠与现实诱惑决定了它是反映某个时代的最为直观的图片。恩格斯在1883年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撰写的序言中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②。政治思潮不是在追寻观念史中的永恒,而是在表达一个时代的主题。所以,研究政治思潮,只能在历史的变动中寻找其赖以产生的土壤。真正把政治思潮与时代的节奏联结起来,就必须建立在对时代主题的把握之中。所以,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本书要关注人们之所思,但又要“思”而不“呆”;既关注潮起潮落,又要回归时代之主题。在动与静的结合中,品味政治思潮的价值,体会时代变迁的节奏。

(一) 政治学在中国的恢复与政治思潮

政治思潮与政治认知、政治心理的区别,显示了政治思潮必然拥有一定的学科基础和学术基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后,由于政治学在中国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正式取消,政治思潮也就丧失了赖以立足的学科基础。尽管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对政治问题的思索,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思考都能转化为社会所共知、共享的政治思潮。只有当政治思考拥有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学科基础之后,才能借助学术资源和学科资源,转化为一种系统化的文化力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232页。

1978年,邓小平倡导政治学应该赶快补课,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高校恢复。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为政治思潮的产生提供了学科支撑和学术支撑。

政治思潮不是一般的流行观念,尽管某种观念被冠之以某种主义,也难以划归政治思潮的行列。正是因为有一定的学术支撑和学科支撑,所以,任何一种政治思潮都包含着弘扬某种价值或者解决某一问题的政治图案与政治设想。政治学在中国恢复之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它与中国学术资源和国外学术资源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结。因此,在多种政治思潮的背后,我们依稀能够体会到现代学术资源和国外学术资源的影子。像民族主义、新权威主义、西化论、新传统主义等等,既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结性,又包含着现代政治学的某些内容。如果没有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就不会以这样的面貌出现,而是充斥着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批判和随机性的政治思考。

(二) 社会变革与政治思潮

政治思潮不是凭空产生的。马克思曾经说过:“‘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①。”政治思潮首先是一种精神产品,但这种精神产品却摆脱不了社会、经济变革的纠缠。因此,政治思潮往往是新旧世界交替时代的必然产物。政治思潮与“革命”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在革命观念盛行的年代,也是政治思潮旺盛的年代。于是,我们便会看到,在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各种“主义”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在中国历史上,清朝覆亡之后,各种政治思潮交替登场,整个现代史可以说是各种政治思潮粉墨登场的历史。革命摒弃了帝制时代,但并没有为人们带来一个崭新的中国,各种政治思潮的出现即为人们在混乱、迷惘年代进行政治思考的产物。正如1815年以后欧洲出现的各种“主义”是拿破仑战败之后新旧世界方生未死时代的产物一样^②,中国现代丰富多彩的政治思潮也是中国新旧世界更替时代的产物。同样,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也根源于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尽管这次革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但它同样代表着新旧世界的交替。因为中国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页。

② [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新旧时代交替的时代,政治思潮与革命的亲缘关系便充分显现出来了。

政治思潮的兴起,从表面上看,是对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及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文化反应,实际上,它展示了一种诊断和反思中国问题的政治期望。这就是政治思潮的实践取向。在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的过程中,有许多问题成为各种政治思潮关注的核心。政治思潮的实践取向和问题取向,使政治思潮脱离了虚幻的想象和抽象的批判,从而转化为一种展现和支撑中国政治发展历程的现代思想资源。

(三) 知识群体与政治思潮

政治思潮是与知识群体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和思想是赋予人们思索政治生活的源泉。所以,要研究政治思潮,就离不开对知识群体的关注。因为知识群体既是政治思潮的生产者,又是政治思潮的表达者与传播者。西方政治思潮的勃兴是与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他们在一个社会内诱发、引导和塑造表达的倾向。尤其是针对注重实际的要求,他们以“不实际的应然”相抗衡。他们自命为理性、正义和真理这些抽象观念的专门卫士^①。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的理性代表者,这种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之间的张力是西方世界政治思潮潮起潮落的根本原因。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的兴起也根源于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之间的断裂,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萌生与此也有一定的关联。

中国的知识群体在古代就是指居于四民之首的“士”,“士”乃精神贵族和政治贵族的复合体^②。科举制强化了精神贵族和政治贵族的复合性,所以,

①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② 余英时将“士”称为“知识阶层”,费孝通称为“知识阶级”。本书将其称为“知识群体”。这一知识群体的特征是:(1)支撑他们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资源是知识和思想;(2)在古代中国,这一群体凭借自身的知识资源,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如科举制)得到统治者的政治认可,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士”乃“文字铸就的阶级”;在当代中国,知识群体凭借自身的知识资源实现对各领域的介入,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介入途径较为单一;20世纪90年代之后,介入的途径趋于多元化,介入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展。参见刘建军:《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一项对政治知识基础的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在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中,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间的张力因为精神贵族和政治贵族的复合而被抵消掉了。但是,这种复合传统因为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而丧失了。知识群体在丧失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的制度化通道的同时,也逐渐拥有了独立于国家权力体系之外的公共言论空间。这一公共言论空间主要是通过报业、学校、刊物以及其他出版业等载体体现出来的。近现代政治思潮的兴起就是与这一公共言论空间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思潮显示了知识群体政治反思的近代气质和求取文化主导的勇气。所以,我们认为知识群体乃是政治思潮的表达者。作为政治思潮表达者的知识群体及其变迁是我们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起点。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成为塑造新型知识群体的历史起点,而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潮展开的逻辑起点。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职业化知识分子的重要象征。西方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在政客与知识分子之间划出了一道截然分明的界线^①。尽管这一说法不尽全面,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知识群体追求文化自主权的渴望与信心。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启蒙与救亡的交织,新型知识群体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革命知识分子、专业化知识分子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共同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知识群体的三大结构。建国之后,随着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以及诸多社会科学作为伪科学而被取消,政治思潮就失去了赖以产生的学术土壤和群体基础。“文革”时期,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使知识群体的政治思考能力完全处于休眠状态,知识群体被排除到政治生活之外。

1978年的改革,一方面使知识群体从休眠状态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也构成了知识群体摆脱意识形态化传统对政治生活和政治安排进行重新思考的新起点。因为始于1978年的改革不仅是经济改革的起点,更为重要的是缔造了知识群体政治思考的新起点。从此以后,知识群体政治思考的中心就是试图把被国家权力所吸附的文化权力解放出来,重新担负起对中国问题进行思考与治疗的文化使命。由于文化权力和国家权力在现代社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必然会使政治思潮的变迁呈现出起伏跌宕的局面。事实证明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大动荡基本上就是根源于部分知识群体与国家管理者在现代化内涵、模式与道路诸

^① [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8页。

方面理解上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之后,两者之间的冲突因为现代化共识的达成、知识群体的分化和多种权力中心的形成而逐渐消减,当代中国政治思潮起伏跌宕的局面也就结束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政治思潮,不再是凭借其排他性的价值取向达到颠覆权威体系的目的,而是沿着问题取向表达着一种追寻某种政治价值的呼声与期望。

(四) 知识生产、传播体系与政治思潮

尽管政治思潮发端于知识群体,但是,如果没有一种放大的社会机制,任何一种思想和观念不过是书房中的个人消遣品,难以转化为影响大众的公共力量。所以,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与变迁,也是与当代中国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出版业的快速崛起和教育制度的改革。

尽管印刷术是中国的发明,但印刷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书籍在古代一直是较为昂贵的奢侈品。只是当近代报刊业和出版业兴起的时候,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说:用手稿传递的知识是稀少而神秘的学问,但印刷出来的知识却可以复制和传播^①。所以,出版业和报刊业的出现意味着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的变革。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思潮是通过出版业和报刊业“创造”出来的,在依赖阅读而生存的社会中,出版业和报刊业可以将一种观念无限放大,使其成为一种被公众关注的思想力量。近代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报刊业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报刊在当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近代非正统的知识分子的新的生存方式,又是非官方的新的传播媒介。这种传媒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推波助澜之功,怎么评价都不为过^②。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诞生与传播,也与报刊业、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思潮不仅仅是一种个体化的言说,更不局限于个体化的书写,而是一种能够被放大和扩展的演说与书写。因此,政治思潮是借助现代

①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② 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页。